

胡宏“儒佛之辨”今辨

熊敏秀¹ 汤凌云²¹

(1. 中南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83;

2. 湖南理工学院, 湖南 岳阳 414006)

【摘要】: 儒佛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。为了接续儒家先圣道统, 引导士人积极面对现实, 寻求救国济民方略, 胡宏在理学思想建构过程中展开“儒佛之辨”, 扬儒辟佛, 影响深远。胡宏站在儒家思想正统的立场, 对佛家思想、信仰和学风进行了多角度的批判, 回应了南北宋之际佛学兴盛对儒家道统发展构成的严峻挑战, 但由于论争立场、动机和方法所致, 胡宏的儒佛之辨也留下了历史的局限和认知的偏见。对此进行冷静反思, 可为当今儒学和佛学研究以及思想文化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。

【关键词】: 胡宏 儒佛之辨 理学思想史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B2 **【文献标志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004-3160 (2018) 05-0153-07

胡宏(1105—1161)是南北宋之际理学家的代表, 也是湖湘学派的正式创立者。他生前长期在衡山附近讲学, 其思想主要收集在《知言》中。吕祖谦评价它“过于《正蒙》, 卒开湖湘之学统”^{[1]P1366}。至于《知言》之本旨,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有精辟的概括: “孟子以知诚淫邪遁为知言, 胡子之书以是名者, 所以辨异端之言与圣人异也。杨墨之害不熄, 孔子之道不著, 故《知言》一书诸子百家之邪说, 辞而辟之, 极其详焉。盖以继孟子也。学者诚能深味其指, 则于吾道之正且大, 异端之偏而小, 若辨白黑, 若数一二矣。”^{[2]P340}所谓“辨异端之言”, 主要是指胡宏立足儒学来批判佛学, 扫除理学发展道路上的思想障碍。汉末以来, 佛学日盛, 儒学渐微, 社会文化失去了强有力的精神维系。

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中唐, 此后, 尽管韩愈、柳宗元等人复兴儒学的呼声不断, 北宋“五子”既出, 理学臻于极盛, 以弘扬古圣先贤之道为使命和担当。在理学兴起的同时, 佛学禅宗也极为兴盛, 它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传播对儒学的发展构成了思想挑战, 产生了强烈的冲击。这种冲击既包括佛学思想对唐宋士人精神世界的影响, 也指佛教作为一般宗教信仰在民众阶层的广泛渗透。与唐宋之际复兴儒学之士的做法相似, 胡宏也把佛学视为儒学发展的阻力, 对此进行了多角度的批判。胡宏的儒佛之辨已成为儒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,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, 对此进行冷静反思, 可为当今儒学和佛学研究以及思想文化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。

一、内忧外患: 胡宏儒佛之辨的时代背景

儒佛之辨之所以成为胡宏理学思想建构的关键环节, 与其独特的生活遭遇和思想经历有关。胡宏出生于北宋末期, 当时正值蔡京掌权, 宋王朝深受辽夏侵扰, 朝野昏暗, 内忧外患, 终于引发“靖康之变”, 致使“两宫”遭劫, 改元建炎。在金兵追击下, 宋室

¹作者简介: 1. 熊敏秀, 女, 湖南桃源人, 中南大学博士,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师, 主要研究方向: 中国哲学、传统文化; 2. 汤凌云, 男, 湖南岳阳人,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,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, 主要研究方向: 中国哲学。

南渡，苟且偷安，国势一蹶不振。虽有豪杰志士奋起，却也无力回天。胡宏出身于士人家庭，胡宏是胡安国季子，他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圣贤教育，青年时代在京师从学程门高弟杨时，翌年离京，辗转迁徙，与父兄避地荆门，寓居湖湘，在衡山等地建造书院，隐居讲学二十余年，远离政治羁绊，潜心钻研理学，直到晚年去世。

绍兴年间，他上书力主抗金复仇。秦桧握权后，胡宏不愿与之伍，避退不仕。秦桧死后，胡宏被召见，终以疾辞。胡宏亲历了国家危难和家庭变故，目睹社会离乱，遭受过战兵盗匪的骚扰，深感民生艰辛，生活困苦，这都激发起他的担当意识和民族责任。在政治方面，胡宏主张变法，提出练兵、定计、整师旅等治国策略，为恢复中原失地，针对时弊有感而发，表现出不甘接受“夷狄主中国之命”的民族心理。胡宏把他的政治理想和现实关怀作为理学思想建构的出发点和目标，其儒佛之辨的展开就是理学思想建构的重要内容。胡宏把它提升到维护民族尊严的“华夷之辨”的高度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。

朱汉民对胡宏身处的矛盾境地有所分析。他指出，胡宏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，崇奉“儒学总是倡导人们能用一种伦理性的社会理想去改造现实社会，总是把目光集中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之中而不是外在超越的世界之中，因而，胡宏必须保持着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切和积极入世的精神”；同时，“他是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分子，他追求着自己的人世理想和社会理想，而决不愿意同腐朽的现实政治同流合污。”^{[3]P89}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，胡宏对现实政治采取了“议而不治”的态度。他既不依附权贵，也不埋头于理论体系建构，他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原则，高度重视现实危机，追求内圣的道德与外王的事功的相统一，将强烈的担当意识熔铸到儒家之辨这一重大的文化使命之中。⁽¹⁾

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，从思想上挽救民族危亡，这是胡宏儒佛之辨的直接动机，也是湖湘学派的共同特征。胡宏以复兴儒学为志业，追求内圣与外王的统一，其处世态度有士大夫气质和“议而不治”的学理精神。他以复兴儒家道统为己任，把批判佛家作为矫正时弊的有效途径，满腔热情地阐扬儒学，不遗余力地批判佛学。胡宏对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充满了忧患意识：“居今之世，譬如乘敝舟，泛沧海，风涛汹涌，未知攸济。”^{[2]P107}

他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并非太平盛世，而是危机四伏：“今关、河重地，悉为敌封；园陵暴露，不得瞻拜；宗教拘隔，不得相见；土地分裂，人民困苦，不得鸠集；冤恨之气，外薄四海，不得伸雪。”^{[2]P113}面对这样的生存危机，胡宏表现出强烈的不安和深度的焦虑，这种不安和焦虑促使他采取议而不治的思想批判方式，对治国方略加以干预：“学圣人之道，得其体，必得其用。有体而无用，与异端异辨？井田、封建、学校、军制，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。秦、汉而下兴者，虽是英雄，亦岂能胜于圣人哉？改制立法，出其私意，一世不如一世。至于近世，坏乱极矣。”^{[2]P131}“养民”是经世之邦，是富国强兵的基础，“取民”是亡国之兆，胡宏批判佛教占有社会资源和物质财富，在很大程度上，这是基于“养民”的现实忧虑。

面对南宋儒学衰微的困境，时代呼唤有担当的儒士挺身而出，据理立言，力辟邪说，止息天下祸乱。“宋明理学的一个主要任务，就是在精神境界上力图超越佛教。”^[4]胡宏的儒佛之辨可谓应运而生。他满怀忧世情怀，其儒佛之辨就在这种情境下出场。

二、辟佛扬儒：胡宏儒佛之辨的基本立场

辟佛扬儒，是胡宏理学建构的基本宗旨。胡宏结合南宋的政治经济生活状况，得出佛学对社会有害无益的结论。在《上光尧皇帝书》中，胡宏向南宋统治者分析了佛学误国的道理。在他生活的时代，佛教各宗极其兴盛，僧徒遍布天下，数以百万，却毫无社会价值：“问其力田、积粟、输赋税以实仓廩则不知，问其利器械以供上用则不知，问其披坚执锐为国爪牙则不知。”^{[2]P97}胡宏甚至认为，僧徒没有社会价值，甚至有害无益，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天下民生，而是“为国焚修、祈天、祝圣，以救度一切众生”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使用迷信的手段救度众生，这虽然得到某些统治阶层的盲目崇信，实际上并无明显效果。

僧徒祈天作法，却没有促使国泰民安，社会依旧凋敝，“水旱屡兴，蝗螟荐起，戎马生郊，王师伤败”，令人对佛学的社会作用产生怀疑。再说，北宋末年社会动荡，盗贼四起，战乱不已，民不聊生，连皇帝都遭到外族侮辱，那么，佛家声称的祝圣之效、救度众生之力何在？胡宏列举各种事实，证明佛家言谈欺妄。它于事无补，造成了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，使社会纲纪混乱不堪。胡宏

说：“而或者以为朝廷固知其无用，而度牒之入厦，雕镂文章，以自居处，役众徒，致滋味，以自奉养而终其身，其费岂特十倍度牒哉！夫为政以均平天下，而坐纵夫庸愚欺诞之奸化诱善良，失国家丁壮，灭绝天伦，坏乱人纪，百万群居，蠹生民之衣食。”^{[2]P98} 胡宏通过控诉佛学的社会危害，以此引起最高统治阶层的重视，从而实现辟佛扬儒的批判目的。

作为一个力图复兴儒家道统的儒者，胡宏对士大夫对禅学迷恋无疑是十分警觉的，他的使命就是要建立儒学的自信，从佛老的手中夺回失去的地盘。^[5] 胡宏有《九黎乱教》一文，该文把佛学思想归为邪说，认为它造成了长久的社会危害。汉代之后，儒学一直面临衰微和绝灭的局面，其间虽有隆盛之世，然而礼制不行，刑赏不中，民众生存无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佛家传播其学说，诳惑民众，僧徒也乐意为之荐死求生，祈福免祸，其影响遍及天下。上层统治者恬然不知礼制刑赏之本，下层民众安然处之而不知正心修身之实，浮虚言谈遍布天下，因而世情转移，民心不顺，“外饰事君之礼，内怀背上之心”，很少以三纲为己任，舍生取义之士。对此加以总结，旨在挽救与转变颓靡不振的社会风气。

他指出，阴阳刚柔是天地之体，万物是天地之体的作用。人生合乎天地之道，故有君臣之义、父子之仁、夫妇之礼。人际交往，日常生活，酬酢变化，各有法度，应接无穷。《西方佛教》一文介绍了印度佛教厌苦世累而寻求超脱的教旨，并对佛家背离世俗人伦、追求个人解脱的异端见解进行了批评，特别是它强调心法，超然物外，成为胡宏辟佛的重要把柄。佛教从汉明帝时入华，此后或禁或扬，社会影响甚大。僧徒据名山胜地，谈说渺茫，以祸福因果学说愚众，士大夫也争相信仰。佛教广泛传播，从而导致“灭义忘亲，三纲弛绝”^{[2]P224}。胡宏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极为警醒。他认为佛教的局限在于：“彼惟欲力索于心，而不知天道，故其说周罗包括高妙玄微，无所不通，而其行则背违天地之道，沦灭三纲，体用分离，本末不贯，不足以开物成务，终为邪说也。”^{[2]P224}

在他看来，佛教以寂灭为宗，以觉悟生死为大，对于个人洁身自好有益，却不足以开物成务，因而属于邪教无疑。胡宏视佛教为邪说，是以儒家的三纲五常、人伦秩序为评判标准的，他并不注重佛学思想的广度、高度和深度，他反复强调佛家有悖于儒家的道统，不遵循世俗人伦的秩序和法则，因而招致了他的强烈批判。站在儒家的立场讲，佛家的思想和实践都不能谓之尽性，而是丧失本心，它甚至比杨、墨更逊一等。客观地讲，胡宏把佛教划为“西方邪说”，确实有些简单化、粗糙化，经不起学理性的推敲，其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甚至也不如魏晋学术界对佛教的辩难。这与胡宏的佛学造诣有关，更主要的是与宋代理学注重实用功利诉求的反映。胡宏在辨别儒佛异同时，引用过程颐等人的有关思想，这表明他与北宋理学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。

如何辨别儒家与佛家的真实观差异，这是困扰胡宏的一大难题。他以儒家的真实观为至高法则，对佛家的真实观任意贬抑。实际上，不只是儒家追求真理，佛家也同样追求真理。禅宗以般若空观为基础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真实观。不过，佛家与儒家追求的真实境界不在同一层次。大乘佛教所讲的真实是指真空幻有，禅宗认为事物缘起性空，即幻即真，与儒家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认知而建构的人伦秩序有别。胡宏说：“即物而真者，圣人之道也；谈真离物者，释氏之幻也。”^{[2]P13} 在此，胡宏以事物的真实性为线索，强调儒佛之别，指认佛家离物探真，流于空谈。其实，禅宗也有触物即真的思想，这在《祖堂集》《五灯会元》中有大量的例证，正因为胡宏辟佛未能把握佛家真实观的主旨，也就无法从理论上驳倒对方，其批判的作用和效果是很有限的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胡宏关注的是儒家圣贤之道，而不是佛家真实观的实际内涵。

从学术论争的方法讲，胡宏不满于抽象的理论思辨，他更注重从现实生活寻找有利的论据，借此抨击对方，扩大影响。人生在世，应世接物在所难免，但是，儒家与佛家的态度有诚妄之分，“当其可之谓诚，失其宜之谓妄。物象有形影，实而可用之谓形，空而不可用之谓影。儒者之教践形，释氏之教逐影，影不离乎形者也。是故听其言则是，稽其行则非。”^{[2]P34} 依照这样的逻辑，胡宏断定佛家虚妄，有害人心，背离圣王之道，“入于夷类”，批判佛家的言行不一。胡宏鄙视那些多寻空言而不究实用的学者，他们平时“商谈性命之际”，头头是道，然而“临事茫然，不知性命之所在”^{[2]P124}，这也体现出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。

为了增强儒佛之辨的学理性和说服力，胡宏既直面南宋现实生活，又从历史的视野寻找论据。他指出，两汉以来，“干禄仕以盈庭，鬻词章而塞路。斯文扫地，邪说滔天。愚弄士夫如偶人，驱役世俗如家隶。政时儒之甚辱，实先圣之忧今。将寻绎五典之精微，决绝三乘之流遁。穷理既资于讲习，辅仁式藉于友朋。”^{[2]P201} 这是胡宏讲学志愿的体现。“将寻绎五典之精微，决绝三乘之流遁”，他重视经典教育，旨在传播儒家经典，而将佛经排斥开去，这也显示出胡宏对待优秀文化的偏狭态度。

三、圆融不足：胡宏儒佛之辨的历史局限

面对佛学传播引起的思想挑战，胡宏著《知言》以排斥异端。他改造孔孟之学，也是为了抗衡佛老之学。作为胡宏的得意弟子，张栻深知其师儒佛之辨的深层动机。张栻指出：“今之异端直自以为识心见性？其说诤张雄诞，又非当时之比，故高明之士往往乐闻而喜趋之。一溺其间，则丧其本心，万事堕弛。毫厘之差，霄壤之谬。其祸盖有不可胜言者。”^{[2]P339}张栻继承老师的衣钵，进一步开展儒佛之辨，扬儒辟佛。张栻力辨儒佛，其目的在于使那些受佛教影响而迷真的儒者能从佛教的“迷惑”中清醒过来，致力于儒家正学的倡扬；另一方面，也使长期以来在佛教压抑下失去自我的儒者获得理论的自信，并努力提高自身。^[6]

不过，胡宏提出的“性无善恶”“心无死生”等学说也遭到了朱熹等人的质疑。他们认为，这与正统的理学思想不符。从理学思想的系统性看，朱熹等的批判并非没有道理。胡宏的儒佛之辨也同样存在不够圆融之处。

胡宏指出，儒家与佛家的差异是方向性、根本性的，“释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，故听其言如该通，微其行则颠沛。儒者理于事而心有正，故内不失成己，外不失成物，可以赞化育而与天地参也。”^{[2]P3}总体而言，胡宏抓住了儒佛差异的根本。佛家主张心生万法，重视心性的修养和心灵的觉悟，对社会事务不够关心，给人以轻视现实生活的印象。与此相反，儒家历来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关怀现实人生，不离世俗人伦而实现自我，成己成物，参赞化育，改善社会的存在境况。

如果把圣人之道设为正道，那么，佛家与之有方向性的分歧，也有具体路径的差异，其识见和实践都存在偏颇，佛家偏离了对世俗人伦的深切关怀。因此，胡宏指出，要入正道，所见分明亲切，需有圣人指路，笃信力行。他认为，有情与无情体同而用分。人们局限于感性的存在，却不能超越见闻感知，难免困惑不已。他把佛家也归入此途：“以心为宗，心生万法，万法皆心，自灭天命，固为己私。小惑难解，大碍方张，不穷理之过也。彼其夸大言辞，颠倒运用，自谓至极矣，然以圣人视之，可谓欲仁而末至，有智而末及者也。”^{[2]P9}胡宏批判的佛教教义主要属于禅宗一脉。他以儒家仁智之道批判佛学的心学路数，痛惜其言辞和效用局限于佛教教义，不入正途，不能自拔，斥之为“异端小道”。

胡宏并不否认佛学窥见心体，也不否定其言辞和思想的圆融。他最不满意的是，佛学“未知止于其所，故外伦理而妄行”，故不足以言孔孟之道。洞察天地变化、万物受命之理，这是伦理建构的前提。按照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，佛学对心源的体认圆融无碍，却被心灵的日常作用所遮蔽，因而被归为异端学说，不足以言善。很显然，这是站在儒家思想至上的认知起点上的。

胡宏批判佛家障于理事，空谈心地法门。他说：“释氏毁性命，灭典则，故以事为障，以理为障，而又谈心地法门何哉！纵使身心休歇，一念不生，以至成佛，乃区区自私其身，不能物我兼忘，与天下大同也。”^{[2]P122}圣人之道无方所，圣人与天地合德，胡宏也志在建构一个万物一体的大同社会。天伦不可已，秉彝不可灭，佛家的社会效用不及儒家，注定难以实行。这是胡宏的根本立场。他不赞成文中子所云“佛为西方圣人，施之中国则泥”，而认为佛教的局限性在印度已经形成，“泥”或“不泥”并非佛教中国化的结果。这抓住了儒佛差异的根源，却遮蔽了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的流变，其结论显得有些静止而机械。

胡宏以孔子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为尽心的准则，这也是圣人之道最高法则。他批评佛家虽然思想通透，“而所欲不能逾矩，吾知其未见心之全也，猖狂妄行而已。”^{[2]P10}这是对佛教戒律的批评，它抛开了佛教作为宗教的特殊性，如果从辩论的角度看，这似乎抓住了对象的把柄，但稍作推敲，却非公允之言。既然儒家讲究法度，那么，佛家为何不能确立自身的法度观？胡宏以儒家的人伦法度为准绳，对佛家进行定性的评判。依照他的思路，佛家虽然追求心性的超然，但是它无法与之讨论性命之理，更不可能返归性命之正。“无典章法度者，释氏也，安得其心遍该流通与论性命之理而反之正哉！”^{[2]P2}其实，佛家有其独特的法度意识，禅宗也形成了法无定法的法度观，可是，胡宏把佛家的法度局限于世俗的规矩、秩序等领域，其辨析也就难以达到更高的境界。

胡宏理学思想建构以心性论为核心。一方面，他竭力辟佛，对佛学心性论进行了大肆的批判；另一方面，胡宏试图建构以“性”为本的理学思想，将性之流行与心为之主结合起来，也受到佛学心性论的启发。尽管胡宏扬儒辟佛，但佛学心性论对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。这在那些张扬性情的诗歌中流露出来。他静参人世间的宠辱无休，表现出消磨利欲、权达造化、舒卷心境和情

怀。他慨叹人们被红尘所迷,逐物夺利,茫不知返,不识自家面目。他与僧人唱和,护持清静的心田,体现出任运自在的真乐境界,都能见出佛学心性论的影响。胡宏重视自身心性的涵养,追求内圣的境界,抗拒物欲利诱,保持清明的志气。

在《复斋记》中,他对丧己于物、流荡失中、逐物失性的行为深表忧虑,主张排除外诱,涵养内心,修复天性,以平常心应世接物。需要指出的是,上述命题中的“心”“性”具有大乘佛教般若空观的背景。这两个命题的提出,一方面远承孔孟、《中庸》之道,近续周敦颐、张载、二程思想;另一方面,它们也受到佛学心性论的启发。胡宏把未发规定为“性”,把已发规定为“心”,性为体,心为用,心性体同而用异。胡宏反对天理与人欲的二分,主张理欲同体,察理屏欲,也受到了佛学心性论的影响,当然,这已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。

四、结语

总之,胡宏对佛学有较深入的了解,他对佛家、佛学的批判也富有热情,相当激烈。尽管他对佛学思想有不自觉的接受与运用,但总体上持排斥的态度。从学理的角度讲,胡宏儒佛之辨提出的某种观点经不起细致推敲,它们在论证方面也缺乏充分的说服力,况且,胡宏对佛学(尤其是禅宗)思想存在误读和偏见,因而留下了历史的局限,也难免个人认知的偏见。

回顾这一学术史公案,不难发现其偏颇和不足,这是值得深思的。在中国思想史上,尽管这次儒佛之辨的影响有限,但它毕竟发生在南北宋之际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,其目的非常明确,即为了接续儒家先圣道统,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,引导士人积极面对现实,寻求救国济民方略,因此,其发生学意义及历史作用都不可否定。“儒佛最根本的差异最终被归结为致思路向的不同,而这种不同又是其所属的人文形态规定的。”^[7]胡宏的儒佛之辨注重思想的实际效用,对湖湘学派经世致用传统的形成示范性作用。对于胡宏的儒佛之辨,我们不能过分苛求,因为不仅他没有找到一种辟佛的理想方式,这也是历代辟佛之士都未彻底解决的理论难题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(清)黄宗羲,全祖望.宋元学案(卷四十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- [2] (宋)胡宏.胡宏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7.
- [3] 朱汉民.湖湘学派史论[M].长沙:湖南大学出版社,2004.
- [4] 刘立夫,熊敏秀.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[J].湖南大学学报:社会科学版,2017(4).
- [5] 刘立夫.胡宏心性观中的“儒佛之辨”[J].地方文化研究,2013(4).
- [6] 刘学智,张枬“儒佛之辨”刍议[J].湖南大学学报:社会科学版,2014(1).
- [7] 陈赞.儒佛之辨:理学的一个向度[J].中州学刊,1998(2).

注释:

1 胡宏曾拒绝秦桧的出仕要求,他说:“稽诸数千年间,士大夫颠冥于富贵、醉生而梦死者,无世无之,何啻百亿。虽当时足以快胸臆,耀妻子,曾不旋踵而身名俱灭。某志学以来,所不愿也。至于杰然自立志气,充塞乎天地,临大节而不可夺,有道德足以赞时,有事业足以拨乱,进退自得,风不能靡,波不能流,身虽死矣,而凛凛然长有生气,如在人间者,是真可谓大丈夫矣。”(参见《胡

宏集》)。